

人文  
学术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周 宁 著

# 跨文化形象学

Cross-Cultural Imagology

 复旦大学出版社

周 宁 著

# 跨文化形象学

---

Cross-Cultural Imagology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形象学/周宁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张辉, 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10418-9

I. 跨… II. 周…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4330 号



跨文化形象学

周 宁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25 字数 212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418-9/I · 820

定价: 3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顾问：乐黛云 杨慧林 谢天振

陈思和 陈跃红

主 编：张 辉 宋炳辉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总序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终于将陆续与读者见面。从动议编辑这套文库到如今变成现实,其中真是颇多可感怀之处。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中生代”比较文学学人一次小小的集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我们献给自己师长们一份迟交的作业;“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又是我们给各位同仁、乃至更年轻同行们发出的对话与批评的邀请。

多年的酝酿筹划、多年的协同努力,使我们逐步将自己的工作与更深远而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联系了起来,并开始慢慢融入其中。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新一代”比较文学学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都无不受惠于祖国的开放改革,受惠于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受惠于同辈间的切磋琢磨。我们是这十五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段文化积淀的受益者,也是一批如饥似渴的学习者和无比幸运的历史见证者。我们也许注定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但我们却也应是承先启后的“桥梁”,必须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而这里记录的正是我们探索行进的脚步,也是我们对自身所从事的学科一点微末的贡献。

百年中国文学“走向(进)世界”的历程,给了我们思考过去、筹划未来的“底气”;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为我们准备了难能可贵的学术资源和不可或缺的学科建制。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以之与我们所属的学科名称相呼应,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打破界限,超越学科、语言与文化的限制,乃是我们比较文学学人的使命乃至宿命。是的,我们无疑拥有不同的学术爱好、志趣和观点,但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把我们联

系在了一起——那就是,我们必须在世界的语境中,以比较的眼光,从多学科的视域,面对并尝试回答我们所浸润其中的文学与文化问题。

“德不孤,必有邻。”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富于活力和学术追求的知识与精神共同体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们要送上我们衷心的谢意。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与这套“文库”相呼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辑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系列”等姊妹项目也已次第启动。

在“文库”陆续面世的这个特殊时刻,先贤们的声音似乎又一次在我们的耳畔响起。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文化的崛起须“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响应先贤的号召,集结这套文库,仅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取今复古”、“扩大恢张”的行列中,贡献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希望我们会有继续编辑以后各辑的荣幸。

是所望也,谨为序。

编者

2013年5月初稿

2014年4月修订

# 目 录

---

|                            |     |
|----------------------------|-----|
| 导论：跨文化形象学的问题与方法            | 1   |
| “孔教乌托邦”：在西方现代性的社会期望与审美期望之间 | 16  |
| 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     |
| ——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         | 41  |
|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 65  |
| 停滞或进步：中国现代性的他者困境           | 91  |
| 东西南北“中”                    |     |
| ——俄罗斯思想中的中国                | 129 |
| “我们遥远的近邻”                  |     |
| ——印度眼中的中国形象                | 172 |
| “巨大的他者”                    |     |
| ——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 204 |
| 奈何问题，若何方法？                 |     |
| ——有关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反思            | 234 |
| 后记                         | 250 |

# 导论：跨文化形象学的问题与方法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及其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真正的问题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笔者在不同地方一再说明，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不是简单地描述中国形象的特征与演变过程，而是深入反思中国现代性自我的奠基性问题。现代中国是在西方现代性这面镜子中进行自

我观照与自我确认的,西方作为他者,在知识与权力意义上,可能对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构成“想象性压迫”,因此,如何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将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从西方这一强制性他者的“知识—权力结构”中解救出来,就成为中国现代性主体自觉的手段与使命。

在这一宏大问题下,跨文化形象学开始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其理论方法来自福柯的话语理论,基本假设与价值取向则取自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斯图亚特·赫尔的文化研究理论。在该理论背景下开展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研究,首先需要明确的概念是如何看待西方的中国观,是假设其作为知识具有真理意义还是假设其作为“表述”只问是否有效而无所谓真伪。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某种掺杂着想象与知识的“表现”(Representation),在这个前提性概念上,跨文化形象学的知识立场是后现代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性文化精神的隐喻,是西方文化为在世界观念秩序中认同自身而构筑的文化“他者”。<sup>①</sup>

跨文化形象学从形象学角度提出问题,又进一步在西方现代文化或现代性精神的深度上分析问题。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视野内展开的跨文化形象学,核心问题是知识与权力的问题。就知识层面的意义而言,我们关注西方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延续方式。在理论上,我们分析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我们有必要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在历史中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类型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就权力层面而言,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性世界体系中的实践功能,分析

---

<sup>①</sup>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sup>①</sup>。

基本概念确立之后,跨文化形象学开始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概念层次上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其中形象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类型是个中枢性概念,表现形象作为一种文化仪式的程序化过程;原型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西方的中国形象在最初的500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是被美化的、乌托邦化的,表现为“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种形象类型,分别强调三个层次不同侧面的意义:从物质财富、制度文明到思想信仰;经历了器物、制度与思想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西方现代化早期历史的三个阶段:1350—1550年、1550—1650年、1650—1750年。

西方现代性历史中出现的中国形象,大概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以1750年前后为界。此前中国形象的三种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在美化中国的总体趋势上是相同并递进深入的,这个总体趋势是乌托邦化。1750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一系列彻底颠覆中国形象的著作都出现在这个转折点,此后中国形象逐渐被丑化,出现了另外三种类型,停滞封闭的帝国、专制暴政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

在“西方现代性自我构建的乌托邦化他者”意义上理解中国形象。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他者”镜像,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表现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冲动;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与排斥、表现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这两种他者镜像与曼海姆区分的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意义相同。乌托邦是超越的、颠覆性的社会想象,而意识形态则是整合的、巩固性的社会想象;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乌托邦可能转化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也可

---

<sup>①</sup>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第17页。

能取代乌托邦。<sup>①</sup>

解构了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的中国形象,然而,又怎么样呢?在话语理论中,知识的意义是与权力合谋,权力才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西方现代性世界想象将中国形象纳入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秩序中,重要的是权力,是在文明征服野蛮的旗号下进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的权力。就西方而言,中国形象的意义在西方现代性自我奠基与自我认同,为西方现代扩张的世界体系提供文化价值根据。跨文化形象学的研究任务,就是破解其知识体系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历史乃至全球化历史中的意义。

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纵深处研究中国形象的历史,有三个关键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二是中国形象的转折点;三是中国形象的现实再生点。1250年前后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1750年前后是中国形象史的转型点,而当下是西方中国形象的再生点。在起点问题上,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生成中的意义;在转折点上,我们关注的是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转型以及西方现代观念与现实关联互动的历史问题;在现实再生点上,我们关注的是当今世界西方现代性观念秩序或世界观念体系问题,其中现实再生点直接对应着跨文化形象学的核心问题,即中国文化自觉的现实语境。跨文化形象学起于“西方问题”,终于“中国问题”,有真切的中国现实关怀。

## 二

以1250年前后为起点,西方历史上首先出现的是一系列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史发生了一次根本的

---

<sup>①</sup>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四章;又《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第3编第3章。

转型。造成这次转型的有多种原因,但总体上看,可以归结为现实与观念两个方面。现实方面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进程相关,观念方面则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形成的过程相关。西方扩张史,如果从蒙元世纪大旅行算起,可以分两个阶段:1750 年之前与 1750 年之后。蒙元世纪西方大旅行,是西方现代扩张的前奏。蒙古帝国崩溃,东西商路中断,大约从 1350 年到 1450 年,出现了一个间歇期。随后的两个世纪,西方扩张达到第一个高峰。到 1650 年,西方扩张的第一次高潮停歇下来。伊比利亚人奠定了东方贸易网,荷兰人继承下来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该体制的作用。但东西方的力量平衡尚未打破,莫卧儿帝国、中华帝国依旧强大。1750 年前后在西方扩张史或东西方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方扩张进入新一轮、也是决定性的一轮扩张期,从 1750 年到 1900 年这一阶段,西方世界性的扩张基本完成了,其重要事件是大英帝国最初兴起与中华帝国最终衰落。

1750 年前后英国的黄金时代到来。从 1688 年完成“光荣革命”,到 1763 年、1764 年最终赢得英法七年战争和英荷三次战争,英国确立了它在西方扩张势力中的优势地位。同时英国逐步在印度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准备了征服中国的基地,彻底扭转了东西方势力均衡的格局。这一系列重要事件的深远历史意义在于:一是在美洲出现了讲英语的“第二个英国”——美国,而美国在大英帝国衰落后继承了它的世界霸权;二是在印度建立了殖民地,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最终摧毁了中华帝国,在西方的东方扩张完成的同时,东方的现代化运动也开始了。以 1750 年前后为历史的分界,东西方关系的格局变了,西方扩张进入最后的凯旋阶段,东方帝国——萨菲王朝、莫卧儿王朝、最后是清王朝,先后衰落。

1250 年前后的起点,西方现代扩张开始,1750 年前后的转折,西方扩张进入凯旋阶段,这两个点对西方现代化与世界历史、对中西关系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没有 1250 年前后出现的大旅行的条件与仰慕东方的心态,西方不可能开始现代资本主义

扩张;没有 1750 年前后出现的世界格局与东西方力量平衡的改变,西方扩张不可能最后凯旋,西方的中国形象也不可能转化,从仰慕到憎恶,试想一个衰落失败的帝国能够赢得它的好感与羡慕吗?

1250 年前后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从 1250 年前后到 1750 年前后的五百年间,西方社会文化完成了从中古进入现代的过渡转型期。1750 年前后,也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或分界点。1750 年前后,发生了英国、美国与法国革命,完成了“古今之争”与“东西之争”,启蒙运动蓬勃展开,现代性最终确立。从时间的偶合上,我们发现中国形象的转型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形成之间,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联。

1750 年前后,西方文化发生了从“离心主义”向“向心主义”的转型,理性主义核心取代基督教信仰核心,重新确立了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启蒙运动完成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古今之争”与“东西之争”,确立现代胜于古代、西方胜于东方的现代性叙事,它由三大部分构成,进步大叙事、自由大叙事、文明大叙事,共同构建起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念。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确立,成为改变中国形象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成为启蒙大叙事的否定面,中华帝国是停滞的、专制的、野蛮或半野蛮的东方帝国的典型。

跨文化形象学在解构知识的同时也在解构知识与权力“合谋”的方式。造成西方的中国形象转型的真正原因,是西方文化结构中中国形象的功能的转变。在西方现代性的形成阶段,西方知识分子作为上升集团,曾经将中国形象当作反抗教权、限制君权,争取信仰宽容、思想自由、政治开明的思想武器。中国形象的主要功能,是西方现代精神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乌托邦。而随着西方现代性在启蒙运动中确立,现代性观念成为西方社会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中国形象也就相应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批判、排斥、否定的低劣的“他者”。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乌托邦进入意识形态,成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不再是批判西方的现存观

念秩序,而是巩固这一秩序。

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社会集体想象物,随着西方现代精神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1750年前后西方现代性确立的关口上,它从乌托邦期望进入意识形态视野。我们研究观念史的问题,有三个层次:一是认识论的;二是心理学的;三是社会学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转变,可以探讨知识的积累与认识的进步,但不能解释形象转型的根本原因。进一步的分析必须深入心理学与社会学层次,关注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功能。曼海姆讨论乌托邦与意识形态问题,萨义德从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出发批判东方主义,关注的共同问题都是思想与社会权力的关系。西方现代历史不只是一部经济政治扩张史,还是一部文化扩张史,是西方现代文化宰制、排斥世界其他文化类型的历史。

启蒙运动全盛期,资本主义经济、民主政治、启蒙文化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文化的主导力量,充满自信的自足的西方现代文化,此时期待的异域形象,已经不再是具有文化超越性的乌托邦,而是自我确认自我满足性的意识形态性“他者”。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关注的也就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东方主义。

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纵深处研究中国形象的历史,第三关键点是中国形象的现实再生点。再生点包含着纵向继承与横向延伸两个向度的问题。就纵向继承向度而言,我们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基本类型与原型一旦确立,就会在历史中不断复制自身,为现实的中国形象生产提供基本方法与意义。就横向延伸向度而言,西方的中国形象逐渐溢出西方,获得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话语力量,非西方乃至中国本身,都开始在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体制中表述“中国”,于是,当今世界观念秩序中“彼此东方化”与“自我东方化”就同时成为醒目的问题。

笔者的研究在现实再生点上展开,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为起点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最终发展出三组问题:在为“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写的导论中,笔者对跨文化形象学的“三组问题”作了大致的

规划<sup>①</sup>,并提出进一步思考的方向: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第一组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第二组问题的研究,主要在《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和笔者主持的丛书《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中;第三组问题的研究仍在进行。

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为起点,在现实再生点上横向展开的主要问题是在上述第二、第三组问题。在第二组问题中,笔者以俄罗斯、印度、日本几个周边大国的中国形象为研究个案,发现的问题与提出的观点概括性地表述在《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的前言中,它包括四个在逻辑层面上不断深入的问题:“一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各自的特征及其演变的历史,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国形象及其表述策略,其动机与形式都具有自身深远的文化根源;二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越来越频繁便捷地进行‘跨文化流动’,形成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无法‘独自’地表述中国,其表述资源与策略都具有跨文化特征;三是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中存在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往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其设定问题、提供思想资源、想象方式与表述策略。西方的中国形象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表述,这一点不论在俄罗斯、印度还是日本,都表现得非常充分;四是这些地区或国家的中国形象,既意味着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隐喻着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其中包含着一

---

① 三组问题为: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见周宁主编:《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总序》,人民出版社,2010年)

个特定的、纠缠不清的、危险的三角关系。”<sup>①</sup>

对世界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研究,其中暗含的结论可能是,在一个西方现代性主导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的意义是不自足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再生产形式。就这一点而言,有的朋友已经明确指出它的理论困境,名义上是在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国家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在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这些地区国家的再生产形式。笔者并不回避这一点,不仅事实也是如此,而且,它也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题域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帝国主义扩张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文化帝国主义既是帝国主义扩张总体过程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结果。随着西方扩张的经济政治霸权形成,西方文化霸权也逐渐形成,不仅决定着西方文化自我确认的方式,也影响并支配非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东方主义正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集中表现。

### 三

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问题的研究迟迟未能全面展开,几乎变成了一个哈姆莱特式的“延宕”。或许迟疑并不是因为消极的思想惰性,而是因为积极的反思怀疑。早在进行第一组课题研究时,笔者已经关注到第三组课题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早在2001年笔者发表在《书屋》(2001年10月)的《停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已将讨论的问题延伸到“停滞的帝国”的神话如何规训中国现代化自我想象的问题,甚至认为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与现代性自我认同,都与西方现代性设置的中国形象密切相关,我们是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自我确证甚至自我改正的。早在2003年笔者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5期)的《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已经开始尝试解构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中隐含的西方中国形象

---

<sup>①</sup> 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页。

的话语霸权。当然,这些文章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有诸多可疑与可误解处,因为知识的语境变了。

跨文化形象学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同样也应该解构中国的中国形象或者中国的自我想象。西方无法公正客观地表述中国,中国就可以公正客观地表述自身吗?目前学界有关的中国形象研究,总有按捺不住的现实关怀,那就是所谓的“国家形象战略”,如何打造中国形象的问题。这种思路隐含着跨文化形象学理论方法上的自相矛盾。中国可以表述自身吗?这不是一个葛兰西式的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而是一个福柯式的话语理论的一致性问题。跨文化形象学对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的批判,用意只是关注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外源性”或“翻译性”,揭示西方文化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知识霸权,反思第三世界现代性的身份认同问题,第三世界知识生产是否能够为他所属的文化的现代化提供自由的主体性与合法性证明。

其实,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的合法性就可质疑。谁具有中国形象的表述权或表述中国形象的合法性?笔者上述两个个案指出了第三组课题的方向与方法,也暴露了第三组课题的潜在的矛盾与疑问。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是在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中进行的,如何想象现代西方决定如何确认现代中国。如果肯定西方现代的科学进步、自由民主、理性文明,中国的自我认同方式就只有一种选择,即认同西方,将西方现代性想象为中国现代性的合理内核;如果否定西方现代性,就等于否定现代性本身,而这又是违背公理与普遍价值的。没有人可以否定科学进步、自由民主、理性文明这些公理与普遍价值,只能否定现代西方作为这些公理与普遍价值的主体的合法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是在现代性观念与价值基础上进行的,只不过对西方作为现代性观念与价值的主体,有不同意见,因此,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分歧不在知识与观念上,而在价值与权力上。

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这个